

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 Research

.....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

陈俊杰◎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013029479

F11-0
161

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 Research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

陈俊杰◎著



F11-0
161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01302847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陈俊杰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ISBN 978-7-5068-3352-3

I. ①国… II. ①陈… III. ①世界经济政治学—研究
IV. ①F1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9182 号

责任编辑/ 于建平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6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352-3

定 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论,涉及探索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建构路径的哲学视角。本书的前两章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的逻辑起点,从学科建构的角度上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建构的来龙去脉作了纵向的梳理,接着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主流范式作了横向的述评。本书中间两章以上述知识谱系为基础,进而应用相关的批判理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范式作了深入的批判,接着应用相关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范式作了全面的比较。本书的后两章以传统范式论为基础,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基本趋势,专门探讨了建构多元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可能性,接着根据中国学派的研究现状,专门围绕建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作为第一部分,“导论”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即选题的背景、选题的目的与选题的意义,以及分析的框架、分析的方法与分析的创新。本书认为,西方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日益滞后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多元化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在到来。本书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论研究,而不欲止步于对该学科的泛泛之谈。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形成主流以前,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作专门化研究,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本书的范式论视角,既有纵向的阶段维度,又有横向的结构维度,既有深入的范式批判,又有全面的范式比较。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方法,兼顾政治学方法与经济学方法。在分析多元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的优点与缺点的基础上,如何建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将是本书谋求国际政治经济学

范式创新的一个重点所在。

正文的主体部分共有六章,以下分别简要介绍这几章的内容:

第一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学科探讨”,论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构。本书认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有四个发展趋势:一是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传统模式与新兴模式的综合,将导致学科范式多元化;二是在学科交叉上,进一步促进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平衡与交融;三是借经济全球化之势,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向国际层次转移;四是通过“去国家化”,最终完成“全球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

第二章“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流范式”,论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主流范式,即现实主义范式、自由主义范式与马克思主义范式,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流之争。本书认为,当代西方大国一贯搞双重标准,即在理论宣传上鼓吹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实践上却奉行新现实主义,而对二者的批判又催生了新马克思主义。

第三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的批判”,分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批判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论,论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情况。本书认为,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范式,尤其是漏洞百出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范式论,很难套用历史学派和问题学派等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建构“中国特色”只能由中国学术界自力更生。

第四章“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比较”,分析了西方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应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范式论,当代学术界对三大传统范式的比较研究,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之争。本书认为,三大传统范式各有千秋,多元主义对三者的折衷调和将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转换的主要趋势。

第五章“建构多元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可能性”,分析了多元主义范式的发展空间、理论工具、结构设计与制度实践等。本书认为,多元主义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而不可能长期发展下去,如何克服多元主义的简单折中主义和技术层次局限,将是多元主义范式要面对的主要课题。

第六章“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分析了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情况,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以及如何建构

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本书认为,中国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建构,应该以马克思主义范式为主体,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范式为辅用,站在发展中国家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致力于为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建言献策。

作为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结论”对最后截稿情况作了简要总结:首先,根据上述六章的主要内容,对正文的基本论点和分论点作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认为库恩设计的“范式”的确是一个有一定的相对主义色彩的后现代主义概念;其次,围绕本选题涉猎的范式提出了有待进一步挖掘的理论空间,如层出不穷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最新发展动向等,使得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交叉学科的理论综合有必要及时更新;另外,对本范式的进一步研究方向作出展望,即在主权国家模式形成以前已有的古老模式,如城邦-诸侯模式、封建帝国模式、宗教-世俗模式等,似有必要借鉴于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建构;最后,交代了本书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如综合研究不够系统、经济视角不够全面或哲学思辨不够深入等,对当代中国国情的不同论断导致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建构不得不面对一系列严重的学术分歧。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1
第二节 分析的框架、方法与创新	10
第一章 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学科探讨	15
第一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15
第二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构	36
第二章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流范式	45
第一节 现实主义范式	45
第二节 自由主义范式	53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范式	62
第四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流之争	73
第三章 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的批判	84
第一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	84
第二节 对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的批判	99
第三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情况	106

第四章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比较	116
第一节 西方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应用	116
第二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范式论	123
第三节 当代学术界对三大范式的比较研究	128
第四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之争	132
第五章 建构多元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可能性	139
第一节 多元主义范式的发展空间	139
第二节 多元主义范式的理论工具	144
第三节 多元主义范式的结构设计	152
第四节 多元主义范式的制度实践	157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	162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情况	162
第二节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170
第三节 如何建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	180
结 论	198
第一节 基本观点总结	198
第二节 有待挖掘的理论空间	200
第三节 进一步研究方向	204
第四节 本书可能存在的不足	210
参考文献	214
后 记	222

导 论

作为导论部分,这里重点概述本书要重点论证的是六个方面的问题,即选题的背景、选题的目的与选题的意义,以及分析的框架、分析的方法与分析的创新。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总的来看,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只有不到40年的学科发展史,主要是因为该学科的范式奠基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近代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阶段。在15世纪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尚未受到重视。随着主权国家进一步发展,英国、西班牙、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欧洲强国确立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对各国经济结构的影响逐步加强,经济领域由此成了政治冲突的重要舞台,各国往往根据政治需要调整经济关系。1776年,亚当·斯密开辟了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创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卫·李嘉图、让·萨伊等以此为基础,先后将研究重点转向国际贸易领域,从而为近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萌芽埋下了伏笔。

二是帝国主义新古典庸俗政治经济学阶段。到了19世纪末期的帝国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激化迫使西方学者局限于对经济现象的实证而不是对经济政策的规范。W. S. 杰文斯呼吁用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A. 马歇尔正式取消政

治经济学这一名称以标榜其“超政治性”。^① L. 罗宾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学,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阐述经济系统本身的运行而与价值观念无关的一般规律,它讨论经济领域中公共政策的原理。”^②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去政治化”,导致近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戛然而止。A. 马歇尔终结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传统,国际经济学致力于对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实证分析;以 A. J. 格兰特为始作俑者,国际关系学等于国际政治学成了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此后,政治与经济等因素分属两个独立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迥异。导致这一分离的主要背景,是 20 世纪初期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工具摒弃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观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二分法强调:经济关系的基础是生产与分配等因素,受到自然法则的制约,其中蕴含的自然和谐只有在不受政治干扰的情况下才能得以保持;政治关系由权力等因素构成,不受自然法则的制约,政治关系不可能兼容而只会干扰自然和谐。结果,对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互动的研究,被人为地割裂为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两种范式。A. 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在 20 世纪初又分裂为两个学派:一是新历史学派承袭德国旧历史学派的观点而否定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应用历史归纳法单纯收罗史料而轻视抽象分析法,强调道德、法律和心理等因素的经济影响,鼓吹阶级调和与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二是边际效用学派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将经济生活归结为“经济人”的欲望及其满足,根据孤立、片面的个人消费动机假设演绎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否定资本主义对活劳动的剥削,论证资本主义符合自然规律而反对工人运动。两个学派既有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外表,又应用数学方法粉饰其“纯粹科学性”,从而满足了资产阶级维护其阶级统治的理论需求。

三是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阶段。二战后期,K. 波拉尼以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为主题,分析了英国在维也纳会议后的所谓“百年和平”期间的对外政策,致力于国际关系的均势、国家、市场和金本位制等综合研究,力图克

① 彼得·格罗奈维根:《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3 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970 页。

② L. 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中主要理论的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 6~7 页。

服传统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学科分立弊端,因此被誉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当然,将 K. 波拉尼视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奠基者也不过分,尽管他本人未必有此先见之明。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使苏东国家认识到闭关锁国有碍于经济发展,由此在经济领域逐步对外开放;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跻身国际舞台,也主动关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经济援助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冷战时期,传统的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迅速合拢,政治冲突与经济合作往往并行不悖,诸多“例外”现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越南战争的结束、美苏关系的缓和以及核裁军谈判的进展等,加快了世界范围的权力政治向相互依存过渡的步伐;随着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日益加剧,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的内部矛盾愈发尖锐;军事力量的影响力逐步让位于经济力量,全球性的贫困、生态失衡与人口爆炸等逐步成了国际社会的谈判议题。对此,传统的经济学、政治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等,无不因为学科分立而难以系统地作出解读,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冷战结束前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其代表人物相继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 1982 年的施蒂格勒、1986 年的布坎南、1991 年的科斯、1994 年的贝克尔和诺斯等。他们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如斯蒂格勒的“俘虏”理论;二是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政治问题,如投票悖论。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不仅在“政治”与“经济”之间重新搭起了桥梁,而且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问世要晚于国际关系学,原因可以溯源到 1890 年,英国经济学家 A. 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一书,由此而兴起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将经济与政治割裂于经济学与政治学等两个学科,导致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建构“胎死腹中”。一战期间,就在欧洲列强激战正酣的 1916 年,A. J. 格兰特出版《国际关系研究入门》一书,为战后的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等政治研究开辟了先河,由此诞生的国际关系学将研究重点局限于政治领域,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从此被边缘化。^① 20 世纪 30 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对现代国

^① 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0~21 页。

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发出了迫切的需求。二战期间,就在欧洲列强激战正酣的1944年,K.波拉尼出版《伟大转变》一书,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范式论基础。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苏争霸的缓和阶段,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日益扩大的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与仍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的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历来左右时代主题的“高级政治”(如军事角逐),逐步让位于“低级政治”(如经济角逐);全球性的贫困、教育、生态平衡与人口控制等问题,越来越成了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面对这些新趋势,西方传统的经济学、政治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等,由于学科分立而很难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呼之欲出。1970年,C. P. 金德尔伯格出版《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结合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等因素综合述评现代国际问题。同年,哈佛大学举办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讨会。此后,西方国家一些大学先后开设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相继形成。1971年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诱发的石油危机,最终促成了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1977年,琼·斯佩洛出版《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学》,后来被西方学术界誉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里程碑式专著。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被人为割裂为两部分:一部分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分析其国际层次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另一部分以国际体系或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为整体进行综合分析。前者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以美国学派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为主要代表(该理论继承了现实主义学派的国家利益概念,认为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本质是对抗性的,但又承认世界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后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不完全是国际关系学的分支,而主要是研究国际关系学的一种方法论(如J.高尔顿的结构主义学派和I.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学派,引进了社会学、心理学、社会经济史,以及马克思、列宁等关于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若干学说,扩大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当前西方学术界的共识是,现代国际体系仍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但是也要重视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国际政治经济机制等,必须研究它们的互动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新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的政治含义。为此,西方学者先后提出“霸权稳定论”与“复合相互依存论”等,标志性刊物有美国学派的《国际

组织》与英国学派的《新政治经济学》等。

截至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对其界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财富的互动关系的科学;二是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运用多种跨学科(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国际问题的科学。面对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①笔者不求盖棺定论,更不敢抛出一个自认为完满的定义来。但是若对上述定义略加概括,则似乎不难避开冒昧之嫌。显而易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内容涉及国际关系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乃至政治学 and 经济学等,研究重点理应是上述学科的“交集”或重叠部分,而不是它们的“并集”或简单相加。本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的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或市场与国家、财富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理论结构上存在多个维系与视角,如国际政治与国内经济、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以及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互动关系等。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范式”定义推而论之,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共有的信念、价值与技术等构成的一个整体。

随着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的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从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

①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王健:《国际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朱文莉:《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邝梅:《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因素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郑彪:《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8. David Baldwin (ed), “Key Concepts in IPE”, Vol. 1,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 ix. Robert Lieber, “No Common Power—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Harpa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1995, p326. Stephen Krasner, “The Accomplishments of IPE”, in 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 p. 108. 杰弗里·弗里德恩、戴维·莱克:《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权力与财富》,纽约,圣马丁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页;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某些“例外”国际现象中,我们能否看出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范式的转换征兆?传统的国家-市场范式是否有可能被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取代?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将面对哪些新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基本路径将涉及哪些要素?鉴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传统理性主义范式遭到建构主义等新兴范式的强劲挑战,^①应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论,以上问题有望迎刃而解。

第一,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范式的核心原则越来越缺乏解释力。当前,由于越来越多的重大国际现象难以沿用主权至上原则作出有效的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范式的一系列核心原则将无力独立应对越来越多的重大国际事务。从消极意义上解读,任何学科范式都有指示器的功能,无力解释的现象越多,越能说明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过于僵化,以至于在面对新的国际现象时不得不削足适履;从积极意义上解读,无力解释的国际现象越多,越能说明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范式的过期程度,越能说明该学科要求范式革命的迫切性。

第二,国内外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代共同体的专业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冷战结束后,国内外学术界一致认为,建构主义(类似于明代阳明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与理性主义(类似于宋代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交锋将是最后一场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战。追根究底,这种在东西方学术界不谋而合的言论反映了传统的国家-市场范式正在刻舟求剑,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理论之争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最近,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重新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派之争转向问题研究,说明所有传统学派的理论都已经无力解释越来越多的重大国际现象,更说明该专业共同体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范式越来越失去信心。新问题与新答案往往是新范式诞生的前奏,经过下一代专业共同体的持续努力,国际政治经济学新范式必将破茧而出。突破往往是从提出局部问题而发起的,随着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将在无形之中浴火重生,该学科的范式革命将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它的旅程。

第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专业共同体越来越受到与本学科相关的边界

^① 王正毅:《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超越“范式”之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第20~21页。

知识的挑战。随着越来越多的全新国际议题的接踵而至,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或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基础,越来越难以满足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发展需求,宗教学、心理学乃至社会学、生态学等边界知识必将渗透其中。面对各种边界知识的多维入侵,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专业共同体越来越疲于应对,甚至失去了对话与自卫的起码能力。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只有进一步扩大其边界知识的外延,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对议题设定、方法应用、概念组合与话语建构等方面的锐意拓展,有望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专业创立新的学科范式而浴火重生。

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论证,范式的基本功能是“用某些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与仪器等——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传统提供模型”。^①推而论之,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意味着该学科一系列全新的定律、理论、应用与仪器等将脱颖而出,原有的定律、理论、应用与仪器等将因为不可通约性而遭到排斥。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新议程,传统问题的意义在新范式中将被赋予新的意义,而新问题的提出也只能是对传统问题的某种引申。那么,在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面对的主要议题又有哪些?

一是分析单位的转换。主权国家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不再是决定性的分析单位,将全球作为一个整体展开综合研究只是时间问题。“必须清醒地看到,传统的主权国家已经受到全球化的严重挑战。全球化是一个穿越国界的过程,全球性是人类对民族性的一种超越。它既要求我们坚持民族性思考,又要求我们学会全球性分析。主权国家仍然是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坐标,但是全球社会也同样是进行比较研究的基本参照。”^②任何学科的分析单位与其研究对象的构成单位都不会完全一致,主权国家尽管仍然是当前最重要的构成单位,但是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迫使我们在更大的分析单位中来处理。除了主权国家,当前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已经出现的分析单位还有可能延伸到地区、文明、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等。

二是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当代主权国家虽然极具能量,但是数量有限,

①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② 俞可平:《全球化译丛》总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而非国家行为体则为数剧增、声誉日隆、影响深远,逐步升级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行为体。“随着在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开放更多的市民和法律的空间,主要的现代国家政府发现创立其它组织类型或为其创立空间,让它们在国家限定的范围内自主运行并承担国家不能或不想承担的任务,对于现代国家而言还是有益的。”^①截至目前,较有影响力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运动、跨国政党与跨国公司等,它们并不是对主权国家的否定与超越,而是要填补主权国家未能覆盖的行为空间,因此都有其独立运作的现实意义。非国家行为体能否与主权国家并行不悖,在同一国际体系中赢得应有的合法性乃至权威性,这个问题在中世纪的宗教-世俗复合范式中尤其不成问题,对于范式革命者而言更应该不成问题。

三是非传统议题的主流化。当代国际谈判议题主要涉及生态治理、环境保护、疾病控制、资源保障、能源储备与贸易合作等,而传统的国际谈判的主要议题不外乎领土分割、危机管理、战争交涉、国际维和与外交斡旋等,昔日的“高级政治”如今却日益被“低级政治”边缘化。在国家-市场范式中,国际议题的基本路径是界定个体边界,而主权至上原则足以指导此类问题的解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从个体出发的思维方式不再有效,因为其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再属于个体范畴,而是越来越有公共属性。这就要求我们摆脱惯性思维的路径依赖,在方法论上向系统思维转换,由此才能站在经济全球化高度有效处理上述非传统议题。

四是要素流动性的加剧。从庞大的物质流、信息流、知识流,到人员流动、资本流动、文化流动,以及各种国内议题的国际影响和国际议题的国内反应等,无一不急需经过规范而形成某种新的秩序。这种流动性正在杂乱无章地填补传统的国家-市场范式遗漏的理论空间,成了一股没有纪律、缺乏管理的新生力量。这股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势必诱发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最终对整个体系造成破坏。尤其是在冷战后期解除管制、放松规范之后,肆无忌惮的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近30年来,从美欧日到亚非拉爆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迫使传统的G7峰会向G20峰会扩大,其达成国际共识的

^①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难度也越来越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贸组织的协调能力正在面对空前严峻的考验。

五是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随着跨国性的联系不断加强,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也在不断向全球范围扩张。这种全球性扩张首先表现为以物质形式打破由国家主权的分割造成的边界限制,然后表现为跨国性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积极合作(如国际环保组织围绕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参与的一系列国际气候大会),最后表现为主权国家内部对各种全球性联系作出的强烈反应(如个别国家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党兴替、群众运动与经济改革等)。在未来的全球性体系中,鉴于某一国家采取的内部措施往往会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国际因素的显著干扰,强化国际协调成了提高国内政策效率的必然选择,相关国际组织的数量、地位与职能将有增无减。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学派在范式论上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为研究国际体系引入了新角色、新程序和新问题,努力解读战后新问世的、传统学科难以分析的国际现象,重新界定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传统范式的基础仍然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国家利益等单位,兼顾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等;最新崛起的结构主义学派与世界体系学派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概念,但又企图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不会激化经济危机。这两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至少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一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发达国家体系为研究对象,以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为研究重点,而忽视对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二是以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要国际行为体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的研究文献较多,而以企业、家庭和个人为国际行为体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的研究文献较少,理论分析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与严密的内在逻辑结构;三是偏重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长期、宏观与总量研究,忽视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短期、微观与个量研究;四是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分析框架和赢得普遍共识的分析工具,不同的理论和学派之间的交流、比较与综合尚嫌单薄;五是对国家行为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之间的区别与不一致性有所忽视,建立在“经济人”的个人行为理性假设基础之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不能简单地套用到国家行为